

顾颉刚与教会大学

鲁 娜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36)

摘 要:顾颉刚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和齐鲁两个教会大学任教十多年,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当初,顾颉刚为了发展学术不得已而选择了研究条件较好的教会大学,但他的学术思想又与教会大学的学术取向发生了矛盾,最终不得不离开。

关键词:顾颉刚;燕京大学;齐鲁大学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3)03-0082-05

顾颉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与教会大学结缘较深的一位学者。但在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几乎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象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教会大学的关系。在学者与学校可以互相选择的时代,这种关系无疑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对教会大学的看法。本文拟探讨顾颉刚与教会大学的关系,并希望通过考察顾颉刚在教会大学的经历,来了解非教会背景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大学的文化心态。

—

顾颉刚以前与教会大学没有一点渊源。1920年27岁的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不久即在北大研究所国学所任助教,并参与编辑当时很有影响的《国学季刊》。在北大的几年中,一方面,北方政局动荡,北洋政府财政拮据,屡屡拖欠北大教员的薪水,使得顾在经济上非常窘迫,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北大教师中留英美派与留法日派门户之见极深。顾颉刚既从胡适受学,又在沈兼士手下任职,而这两人恰是两派的中坚,顾在其中处境很难。所以,1926年夏,顾不得不忍痛离开北大,到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研究教授。不过,他在厦门呆的时间也不长。一则因为他与当时也在厦大的鲁迅关系非常紧张;二则顾认为“厦门本没有文化的根底”,学术气氛太差,一直想走。正巧,1927年2月,厦大风潮迭起,国学研究院停办。此时刚由广东大学改建的广州中山大学来信相邀,于是,顾就到了中山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中文旧书整理部主任,后又参与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期间十分忙碌,为应付课程和各种事务终日无暇。他在1928年2月1日致周予同的信中说:“自到粤以来,教了三种功课,兼了三个主任,办了两种刊物,理了十间屋子的书,惫矣,惫矣,即一刻之闲亦不可得矣!”“弟研究之念,无刻忘之,而竟不能,故甚思北归。”^{[1](P125-126)}行政事务繁复,再加上人事关系复杂,中大的教授有很多是从北大来的,原有的矛盾又在中大延续下来,也使顾耗费了不少精力。因此,顾非常向往摆脱繁杂的事务和人事纠纷,找个清静的地方做学问。他打算在与中大所签一年之约期满之后就离开广州,回北京去。恰好在1928年春,燕京大学再次来聘书(1927年初,顾在厦大时曾收到过燕京的聘书)。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即将成立,燕京可获得大笔研究经费,希望顾能到燕京做研究。这正与顾思返北京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顾就答应了燕京大学。因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和中大学生极力挽

收稿日期:2002-08-29

作者简介:鲁娜(1954-),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留,顾只得应承在广州再留半年。

1929年9月顾正式到燕京大学就职。对于燕京大学来说,请到顾颉刚,这是它网络国内名流来振兴燕京学术的举措之一。当时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一改教会大学以前封闭的用人政策,积极地教会大学以外延聘人才。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也使得燕京获得了足够的经费广事延揽。在顾颉刚到任时,陈垣、容庚、郭绍虞和冯友兰等都已燕京国学所供事。对于顾颉刚来说,到燕京来主要是看中了这里做学问的环境好,而不是选择基督教大学。从1926年离京到1929年回来,三年奔波自感学问上无上进,现在回到北京,他觉得似乎“失去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他在致中山大学文史两系同学的信中说:“这个学校固然是教会立的,但因设在北平,吸着文化中心的空气,故思想比较自由。他们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国学研究所,经费更为稳固。又有前辈先生主持,用不着我去负担事务的责任。”^{[1](P134)}他在给中山大学的前负责人戴季陶、朱家骅的信中解释说:“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间,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问题研究着。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1](P134)}这些话明确表明了顾选择燕京的目的。

顾颉刚在燕大期间,北大曾几次来人邀请他回去。1929年9月,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及史学系代表来邀请顾回北大任教,被婉词拒之。多年以后他还在日记中补记:“予以北大党派太多,攻讦太甚,婉辞拒之,心中痛苦可知矣。”^{[2](P176)}一个月以后,北大史学系再次邀请,顾答应只尽义务,不支薪,不上课堂,不算北大教员。1931年初,蒋梦麟任北大校长,聘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他们都希望顾能回北大任史学系主任。顾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孟真与适之先生均劝予改就北大专任教授,月薪450元,课六小时。此事与予迎养父母极有利。以父母来平,予家至少须用三百余元一月,非现在经济状况可任也。他们要我做史学系主任,则力辞之。不但主任不做,即其它事务亦一概谢绝。总之,必与燕大过同样之生活,然后可就。”^{[1](P140)}北大校长蒋梦麟答应了顾的请求。但燕大方面留顾的决心也很大。司徒雷登不仅当即同意给顾加薪,而且还专门拨付一笔津贴供顾迎养双亲。此外,最让顾动心的是燕京的感情留人。特别是燕京历史系主任洪业以诚相待,使顾“感激泪下,因作书报之。”他说:“史学系中,以您的关系为最深,照了一班人的通例,您大有对我侧目而视的资格,但是您毫无这种意思,依然容许他们(学生)接近我。这足以证明您只有事业心而无嫉妒心,您是要自己做事而又要他人做事的,不是自己不肯做事而不要他人做事的。这就和我的宿志起了共鸣了!我不能得之于十余年的老友,而竟能得之于初识的您,岂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呵!”^{[1](P141)}一方面是燕大盛情难却,一方面又顾虑到北大会受人攻击,权衡之下最终还是选择留在燕大。顾在1931年3月18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北大与燕大之取舍,真成了难题目。此间许多人不放走,当局且许我奉养老亲,住入城内,为我自己学问计,确是燕大比北大为好。”^{[1](P142)}

燕京确实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施耐德说:“在燕京的学者生活是顾早已追求的理想之实现。燕大有学术自由,并按时领到薪水。顾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功课和开展出版事业。”^[3]他把十年来蓄在心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大批成果源源不断地问世,仅一年里就做了数十万字的论文。顾在1926年出了《古史辩》第一册,由于生活飘泊,第二册迟迟不能着手。但到燕京的第一年《古史辩》第二册就出版了。到抗战之前,《古史辩》一直编到了第六册(其中有两册是他支持罗根泽编的)。顾在燕大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出版《禹贡》半月刊。这是顾在燕京、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催生出来的一项成果。这份杂志从1934年创刊,直到抗战被迫停刊,一共出了82期。同时,顾颉刚还和刊物编辑同仁发起成立“禹贡学会”。1936年,禹贡学会在燕京召开成立大会,会员有400多人。这份刊物和这个学会联络了一大批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学生,由此打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

应该说,顾颉刚对在燕京大学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但如果说顾颉刚对燕京完全没有意见,也不尽然。1935年3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组聘顾为组长,顾在给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的几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燕京的看法:“刚为个人研究计,燕京之环境已极好。惟为提拔人才,奖掖后进,倡导文化计,则燕京殊无发展之可能。”^{[2](P120)}“在燕大办事,……不但我等无权,即诸西籍教员亦同样无权,每印一书,必向美国请示,得其答复须越半年,幸而批准实行,又须俟下届预算之订入。又以窘于经费,致最有希望之青年,研

究院毕业后无法留校任助教等职,以继续其学问工作。刚为此辈优秀青年计,不得不别觅出路。”^{[2](P232-233)}显然,在顾看来,燕京确实是个个人搞学问的好地方,但不具备学术群体发展的条件。另外,对于学术研究的方向,顾与校方也是存有分歧的。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包含着强烈的现代动机。这和教会大学中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有一段距离的。顾的这些在内心深处的看法,表明一旦有条件,他还是会另找出路的。

但总体来看,燕京对顾颉刚的学术活动还是比较支持的。顾一到燕京就担任校学术会议委员,后又任《燕京学报》编委会主任。1934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委员会改选,顾当选为委员。在人事上,顾于1930年6月推荐钱穆任燕大讲师,当年9月又荐吴晗任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馆员,都获校方批准。顾自己的《尚书学》研究计划,也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顾颉刚以前一直不愿担任行政职务,只想专心做学问,这可能与他过去常受到人事纠纷困扰有关。但他本身是一个开学术风气的领袖人物。燕京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使顾改变了不任行政工作的看法。1936年7月他被燕京大学聘为历史系主任。顾上任伊始,就修改历史系的年度预算,计划增聘讲师,增设地理课,增开古迹调查实习课。所需经费比上年度多出五千元,亦获校方同意。顾在这一年里大展身手,增聘韩儒林等五人为兼职讲师,聘请史学界名流来燕大讲学。同年顾和冯家升发起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在燕京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历史系学生称,自顾先生主持系务以来,“各方面都有新的计划与设施,颇有一番蓬勃的气象。”“七·七事变”爆发,顾因积极参与燕大的抗日宣传活动,被列入日军要逮捕的学者之首,顾闻讯逃离北平结束了他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生涯。

二

顾颉刚离开燕京之后,先到了甘肃,后至云南,1938年10月落脚在云南大学。起先顾是打算在云南大学工作一个时期的。此时,正值原在济南的教会大学——齐鲁大学西迁入成都。顾在燕京的研究生张维华原毕业于齐大,又回到齐大工作,经张介绍,1939年5月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顾到该校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对昆明的条件本来也颇不满意。一则云南地处高原,顾容易失眠;二是感到内地迁昆明者日多,“北平文化机关几乎尽来,——交际既无时间,不与敷衍又招人白眼,遂致此间有北平之坏处(熟人多),而无其之好处(材料多)。”^{[1](P197)}深感昆明不是作学问的好地方,所以对齐大之邀慨然应允。

1939年9月顾颉刚到齐了齐鲁大学国学所。此次进齐大,他颇想大刀阔斧地施展一番。他一上任就一改国学所在济南时的浓厚地域色彩。首先广邀国内名流来所工作。先请钱穆来研究所工作,并为齐大编辑《齐鲁学报》。又请胡福林(厚宣)来齐大讲授殷商史,同时做甲骨文研究。请吕思勉为齐大国学所购买图书,出版学报。杨宽也曾为国学所编辑过战国史资料。顾还想把北大教授汤用彤请到齐大,不过因故未果。一时齐大国学所人才济济,1940年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11人的“历史编撰委员会”,其中有三人在齐大国学所。其次,广邀知名学者来齐大讲学和研究。先后邀请了叶圣陶、张维思、吕叔湘、闻宥等到国学所做学术演讲。同时,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做校外研究员,请他们提出研究计划,然后和校方签合同,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此外,顾还十分重视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建设。先后创办了《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以及《责善》半月刊。1940年顾与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他还联合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大四校共同创办中国边疆学会,等等。顾在齐大还有一事需提及的,就是申请建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顾本人在燕京已经培养研究生多年,但齐大当时并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招收研究生当然能提高学校的声望,所以刘校长也大力支持顾的计划。1940年5月,齐大向国民政府申请创办文科研究所,先设立历史研究部,正式招收研究生。但陈立夫主持下的教育部不支持,遂使这一计划流产。显然,顾颉刚在齐大与燕大时的心态和行事已大不一样了。如果说在燕京顾还是以个人研究为主的话,那么,在齐大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教育和研究的理念了。他的一些主张起初是得到了校长的支持。虽然如此,顾还是感到一些压力。

但真正的挫折是他和教会大学在学术方向、以及决定这种学术方向的权利结构方面发生了冲撞。顾颉刚的目的显然是想提高齐鲁国学所的研究水平,多出研究成果。但支持齐鲁国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早已将齐鲁大学定位于非研究性大学的范围内。当时,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六所大学:燕京、金陵、

齐鲁、华西、岭南、福建协和中,只有燕京和金陵被允许开展研究生教育及从事学术研究。而对于齐大,哈燕社认为,齐大是小型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应发展本科教育,首先要充实大学普通课程,然后进行高级课程。至于培养研究生工作应由其它大学来做。同时,哈燕社也否定了齐大要扩大研究的做法,并认为齐大对哈燕社的拨款使用不当。1941年12月5日哈燕社托事会通过的齐大基金使用决议中指出:哈燕社不同意将学社的基金用来出版和齐大无关的人的书籍,也不同意用基金资助初学者的研究,而应该用来补助大学中有能力的学者的研究工作(齐鲁大学档案,J109-1-102)。

哈燕社的批评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顾颉刚的计划。不仅如此,哈燕社方面对顾本人也有看法。如1940年叶绥夫不同意顾颉刚使用齐鲁哈燕社主任的名义,声称哈燕社只有一个,在美国剑桥。1940年12月10日还要求顾颉刚解释在燕京时接受哈燕社资助迄今还没有完成的尚书研究项目。(齐鲁大学档案,J109-1-102)哈燕社与顾的分歧,除了对工作重点的看法外,还可能从学术上看法的差别。在迄今可以看到的有关顾先生的材料中,没有看到他对哈燕社这一系列批评的评论,但显然这些事情不会使他愉快,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由于哈燕社每年拨付的款项,接近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常经费,校方一直对哈燕社惟命是从,顾肯定无力扭转局面。所以,他在齐大的工作也从踌躇满志到心灰意冷了。

因此,1941年6月顾应朱家骅之邀,赴重庆担任有国民政府背景的《文史杂志》副社长,他说:“三十年,校中有为予构蜚言者,予不惯与小人乘,乃移席重庆。”^[4]但仍以部分时间在齐大国学所工作。1942年4月正式辞去了齐大职务,主持中国历史学会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1944年齐大新校长汤吉禾再次邀请顾到齐大国学所当主任,顾于当年11月到成都。1945年1月齐大闹风潮,汤校长下台。顾再次离开成都,从此脱离了教会大学。

三

从1929年入燕京,到1945年出齐鲁,期间16年,是顾先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时期。表面看来,顾入燕京是为了好做学问,离开燕京是由于抗战爆发。进齐鲁是为了发展学术,离开齐鲁是由于人事龃龉。此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开办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对其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过程,从反对、排斥到逐步的接纳。至20年代中后期,尽管已有一批非教会出身的学者陆续到教会大学工作,但人们对教会大学仍有一些看法。举个胡适与教会大学关系的例子。司徒雷登曾几次邀请胡适到燕京任教,胡适始终没有接受。燕京曾以哈燕社的名义邀请胡适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他也未去。胡适对教会大学一直比较友好,但似乎也想保持一定的距离。持这种心态的并非胡适一人。1925年初,博晨光请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任教,答应冯可以一半时间为哈燕社做研究,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1926年2月冯到燕京担任哲学教授,并任研究所导师。他对能有时间做研究是满意的,但始终感到教会大学非“安身立命之地”。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于中国有利无害,吾人做之原无不可,但纯在外人机关中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5]教会学校的外国背景和宗教色彩,使得没有这种背景的学者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吕思勉在1925年因朱经农介绍,到沪江大学教国文历史。他说:“沪江风气,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但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6]

顾颉刚进入教会大学比较晚。20年代末30年代初,教会大学在教育部注册以后,名义上归国民政府领导,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日见明显了,民族主义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压力也减轻了。中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在教会大学的中国人,不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学者和学生在接受教会大学时,民族感情的障碍淡化了,使教会大学在20年代晚期能够吸引到一批优秀学者。即便如此,顾进燕京还一再明确表示,自己的选择是爱学术而非爱于教会大学,在与师友的书信中多次申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的确,一向嗜学问如命的顾颉刚,一直渴望有个安静的环境专心治学,他选择燕京、齐鲁,正是为了利用教会大学的学术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学术发展的夙愿。但在教会大学,顾的学术思想与教会大学的学术取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牵涉到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教会大学的方针。因为顾在两所大学任职时,这些国学系所都是在哈燕社的指导下工作的。哈燕社成立伊始,由博晨光和洪业联名向其

提交了《哈燕社备忘录》，提出了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并强调“我们将避免任何新闻评论式和通俗的东西，避免重复其它学者已经作过的解释性的东西。”（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335 - 5124 第 641 页）这是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希望学术与社会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顾颉刚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者经世致用思想，不仅专注于学术研究，而且重视学术的普及。他认为专门的研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少不得”。而普及即是“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融会贯通之后，送往一般人人看。……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2] (P327)} 早在燕京时，他曾亲到黄河流域四省考察，深切感受到民生疾苦，回来即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积极从事民众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顾痛感边疆问题的切要，于是又极关注地理沿革史的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和民族的研究。抗战后他到齐大，就极希望利用当时的条件致力于边区调查。他说“我国西陲交通不便，向少调查，注意之者惟外国人。然外国人之认识中国，必不如中国人之自己认识为亲切。如能趁齐大西迁之际，任此工作，实可激起世界之注意，使本所之地位增高。”^{[1] (P197)} 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与教会大学期望用西方学术模式来规范学术的要求有很大分歧。

另一个原因，中国各类大学往往门户之见极深，非本校出身者往往不为兼容。顾虽然学术名气大，还当过燕大历史系主任和齐大国学所主任。但是顾毕竟没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也不是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学者，他在教会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管理者，就很容易和这些本校的人发生冲突。他在齐鲁所说的为“小人”构言，实际正反映了这种关系。

此外，顾进教会大学是在 1929 年，当时教会大学聘请他及其它学者时，正是其自身人才青黄不接之际。等到顾离开教会大学已是 40 年代中期，教会大学送往欧美的留学生已经渐渐回国，国内自己培养的研究人才也已经成长起来了。对非本校的人才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需求不迫切就可能在礼遇上不会那么的优容有加，这可能也是导致一些非教会出身的学者离开教会大学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 顾潮. 顾颉刚年谱[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3] 施耐德.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M]. 台北: 华世出版社, 1984.
- [4] 顾颉刚. 蕲弛斋小品[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5]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 胡适来往书信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6] 李永圻. 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Gu Ji-gang and Two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LU N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China*)

Abstract: Mr. Gu Ji-gang had once worked in Yanching University and Qilu University—the two prestigious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China before 1949 – for ten-odd years, a period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in his academic studies. For the sake of research work, he had to teach in the two missionary schools, which indeed offered him super working conditions. However, as there exis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 academic concept and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the schools, he had to leave the two universities one after another. By tracing Mr. Gu's experience in the two missionary schools, we may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attitude of the intellectual with non-missionary background towards the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Key words: Gu Ji-gang; Yanjing University; Qilu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万丽玲)